

《吴宓日记续编》中吴宓与方敬的交往考察

凌孟华,王本朝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要:方敬是《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之一,不仅涉及的时间长,而且频率高。方敬既是现代著名诗人,又是有诗人本色的教育家,还是吴宓的同事和领导。由于特殊情势、地位身份和个性气质等,决定了吴宓与方敬的交往具有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效果直接等特点。他们的交往处于朋友与同事之间,有偶然遇见、专门访晤、赠送礼品、参加会议等方式;有寻求政治指导、谈论文化名流、咨询其他意见等内容,多涉及政治性与个人性;这些交往给吴宓带来了诸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既解决了吴宓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也给吴宓以充实的精神慰藉。吴宓与方敬的交往既显示了吴宓令人感佩的性情与气质,也呈现了方敬受人尊重的人格和道德,同时体现了建国以来党的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交往的典型特点。

关键词:《吴宓日记续编》;吴宓;方敬;人际交往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4-0129-09

共和国时代的吴宓,虽久居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远离政治、文化和学术中心,但仍喜交游,与不同阶层及不同角色面目者保持着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人际交往。仅《吴宓日记续编》之《中文人名注释索引》列入的人物就多达649人,其中大部分在建国后都与吴宓有过来往。如果再加上有名有姓而未附注释、未列入索引者及有姓无名者、未记姓名者,《吴宓日记续编》提到的人物就更多了。不管是交往时间的漫长、交往次数的频繁,或是交往方式的多样、交往对象的重要与交往身份的特殊,方敬都是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但除方敬后人于1998年5月撰写的《吴宓与方敬》一文外,尚无翔实专门的梳理与论述。该文说:“尽管他们之间在政治观点和文学见解上有差异,但是在长时期相处中,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不仅有公事的接触,还有私人的交往,建立起了超乎一般同事之上的友好关系。”又说:“他们都去世了。记下他们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对了解吴先生晚年的处境和际遇,理解吴先生的精神品格,懂得吴先生为什么是一个真纯的人,是有意义的。”^[1]本文拟借助《吴宓日记续编》中关于方敬的诸多记载,考察吴宓与方敬的交往,以期更全面丰富地呈现二人的交往情形。

吴宓1949—1950年的日记已焚毁,《吴宓日记续编》所存这两年的若干草稿残片并无关于方敬的记载。1951年1月1日,吴宓在日记中写下“外文系主任方敬、教授赵维藩来拜年”^{[2][21]},从此,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正式出场。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里最后出现的时间是1973年7月25日,“上午8时(雨止)出,至大礼堂参加全校师生大会,陈洪主席聆方敬副院长播讲《教育革命》,

收稿日期:2015-11-13

作者简介:凌孟华,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11AZD064),项目负责人:王本朝;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佚文辑校与版本考释”(13YJC751029),项目负责人:凌孟华。

8:30开讲,至10:30毕”^{[3]509}。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了22年有余,遍布从第1册到第10册诸卷,是贯穿《吴宓日记续编》的重要人物之一。方敬与吴宓交往所跨越的20余年漫长时光,几乎伴随着吴宓在共和国时代“第三个二十八年”悲喜人生的始终。

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的时间长,频率高。由于方敬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职务曾多次变动,吴宓对方敬的称呼也多有变化,计有外文系主任方敬、敬、方敬教务长、方公(敬)、方敬教务长(兼副院长)、方院长、方副院长敬、方院长敬、方敬副院长、方公等十余种。从总体上看,方敬出现的频次是惊人的,并有明显的时段特征。文革前相对较多,文革中明显减少,有的年份只有寥寥数次,有的年份没有相关记载(如1949、1950、1970、1971、1974年)。其中1949—1950年日记已被吴宓托付保管的陈新尼教授在文革初期擅自焚毁,编入的只是“日记草稿残片”,1970年日记在文革中“全部丢失”,目前内容系“根据作者所写交代材料、笔记和家信整理”^{[4]133},1974年日记于文革中“失去”而仅剩一纸书目,《吴宓日记续编》上述四年的日记内容没有涉及到方敬,自然可以理解。虽有丢失或因病未记,但相对完整的1971年日记里也没有与方敬交往的记录,说明二人交往也有在特殊年代里几乎中断的情形。

一、交往方式:在同事与朋友之间

吴宓与方敬的交往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偶然遇见、专门访晤、赠送礼品、参加会议、宴饮请客、拜年过节、撰写信柬和传达口信等。兹就前四种方式举例简述如次:

(一)偶然遇见

由于同处西南师范学院校园,吴宓与方敬作为同事,经常偶然相遇。仅《吴宓日记续编》记录下来的就可以列出先后17次:(1)“上午10:00往晤敬,遇于溪桥。”(1951-05-03,以下列出“年-月-日”格式,均为《吴宓日记续编》中的日记时间)^{[2]128}(2)“出遇敬于途。敬婉命勿为外二增授课,恐学生力不任云云。宓唯唯,心疑系劣生团员邹万福赴诉。”(1951-05-27)^{[2]142}(3)“抵校适值会散,多人群出,遇敬。”(1952-06-29)^{[2]376}(4)“阴,小雨。夕出遇方公(敬),步谈少顷,询兰病甚悉。”(1955-06-25)^{[5]207}(5)“宓从良教,拟寻人事科长张莹,而途遇敬,遂即述其事,作为口头检举。”(1955-08-27)^{[5]251}(6)“入校遇敬,告邹开桂准留,但需宓担保,云云。”(1955-10-03)^{[5]284}(7)“邮局遇方敬教务长,立谈久之。”(1955-12-26)^{[5]337}(8)“晚出独步,遇敬偕他客。”(1956-08-04)^{[5]479}(9)“早起,徘徊大门内外,遇敬,谈抚事。”(1957-01-27)^{[6]18}(10)“三四节(10—12)办公楼外遇敬,至教务处闲话,告《住院感想》文,谈济之著作及白屋诗。”(1962-01-25)^{[7]296}(11)“于11:20亲送交教务处成绩股收。遇敬,拟同来宓舍,旋以已近午饭而止。”(1962-01-29)^{[7]298-299}(12)“上午8—12偕徐仲林至文史图书馆(遇敬),指示其陈列之各种参考书。”(1962-08-08)^{[7]394}(13)“8:30出,新大礼堂遇敬等(接见新生)……”(1962-09-04)^{[7]417}(14)“正午,回舍,途遇敬,握手为礼。”(1965-06-09)^{[8]147}(15)“遇方敬,彼此笑颌,未及握手。”(1966-06-20)^{[8]462}(16)“午在食堂遇方敬,宓与交言。”(1972-07-01)^{[3]137}(17)“下午3—4出,先至中文系察知无学习……遇李一丁、方敬!”(1972-11-24)^{[3]236}这17次偶遇情形各不相同。从地点看,有遇于溪桥的,遇于途中的,也有遇于邮局的;有时候在大门内外,有时候在办公楼外,有时候在新大礼堂;或在教务处,或在文史图书馆,或在食堂。从时间看,从早起到8:30到上午10:00,从三四节(10—12)到11:20到近午,从正午到下午再到傍晚,直至晚上,全天除睡眠外的全部时段都有与方敬的偶遇。从偶遇情形看,有步谈少顷者,有立谈久之者,有至教务处闲话者;有宓与交言的,有仅握手为礼的,有未及握手的。偶遇后相处时间有长有短,最短的连握手都来不及,稍长者可以握手为礼,再长者才可以彼此谈话,且有少顷与久之之别;而谈话的情形既可以是边走边谈,也可以是站着谈,还可以是换个地方谈。“遇”在不期,“偶遇”更在不期,抬头不见低头见,随时随地皆有相遇可能。不难看出,吴宓与方敬作为同事交往,既频繁又平等,既随意又自如。

(二)专门访晤

在偶然遇见之外,吴宓和方敬之间有目的的彼此互访次数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方敬访问吴宓的次数有20次(不含拜年)。其中1951年7次,分别为4月1、25日,5月11、17、28日,10月7、15日;相关表述依次为“敬匆匆来过”^{[2]103}，“今日上午宓邀敬来”^{[2]120}，“晚8:00敬主系会,见门粘宓请假条,来探病”^{[2]134}，“敬、藩来探病”^{[2]137}，“汪彭庚来,旋偕敬同来……4:00敬再来”^{[2]142}，“已而敬来,谈系务”^{[2]224}，“晚敬来”^{[2]228}。其后,1952年1次(11月2日),1954年2次(6月20日、12月20日),1955年2次(1月13日、12月29日),1956年2次(1月13日、12月18日),1957年1次(9月11日),1961年1次(9月30日),1962年3次(5月10、21日,8月31日),1964年1次(3月26日)。限于篇幅,相关内容及卷册页码不再列出。从访问频率可以看出,1951年的方敬特别看重吴宓。1964年以后,现存吴宓日记中就没再看到方敬登门的记录了。相比之下,吴宓访问方敬的次数还要少一些,仅有12处(不含拜年),分别为:(1)“宓访前日归自京之敬于其宅。”(1951-09-30)^{[2]220}(2)“午饭后晤澄,遵即访敬于其家,自陈诗案,求指示。”(1952-01-09)^{[2]275}(3)“晚饭后……宓走访敬。”(1955-09-09)^{[5]263}(4)“晚8:00至10:30访敬于其家,进新都糕及软糖。”(1956-06-09)^{[5]445}(5)“晚访敬,而澄亦至。”(1956-11-24)^{[5]563}(6)“上午9:00谒方敬教务长,商改宓四月二十三日为《院刊》所撰文。”(1957-04-29)^{[6]70}(7)“8:30—10:00和平村十四舍楼上访敬。”(1958-03-29)^{[6]257}(8)“晚7—9访敬,先见敬夫人何频伽,谈。敬旋归自重庆。”(1960-01-16)^{[9]278}(9)“晚饭后,往谒敬(先遇夫人何频伽于宅门外),与敬谈约一小时。”(1961-07-20)^{[7]120}(10)“9:30—10:30访敬,谈中文系进修生退出《文言文选读》课事,盖敬已先默认之矣。”(1961-10-08)^{[7]199-200}(11)“于是9:30偕骏至教务处谒方敬教务长,请求决示。”(1962-08-04)^{[7]390}(12)“谒敬,谈(1)外出讲学,待陕师大改期。”(1964-01-10)^[10]吴宓这12次访问的频率分布比较均衡,除1956、1961年为2次外,其他8年均是1次。这种均衡说明吴宓对方敬的情感比较稳定,态度是诚恳的。

(三)赠送礼品

赠送礼品也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常见方式,《吴宓日记续编》记载了几处吴宓与方敬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交往。方敬赠送礼物给吴宓主要集中在50年代,共计3次,分别为:(1)“会散后,敬赠城中带来厚糖面饼一,以充晚、早餐。”(1951-07-13)^{[2]172}(2)“敬赠宓英文《联共党史》(简编)一部。”(1951-10-07)^{[2]224}(3)“敬赠宓杭州带回之邵芝岩制小紫毫笔一枝。”(1956-11-24)^{[5]563}有食品、文具,也有《联共党史》。吴宓赠送礼物给方敬则集中在60年代,1962年有3次:(1)“作短函,以《吴宓诗集》一部送赠方敬教务长。”(1962-02-12)^{[7]312}(2)“另作私函,以鼠啮之《法文小字典》赠敬。”(1962-09-03)^{[7]416}(3)“宓以在德国所购之《英法德文小字典》一册奉赠敬,敬收谢。”(1962-09-10)^{[7]423}除了书籍还是书籍,送了字典再送字典,相对较为单一。关于吴宓赠送方敬的三件礼物,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一是吴宓与方敬相交多年,《吴宓诗集》是吴宓唯一公开出版的诗集,仅1959年以来,吴宓就先后赠送诗集给同事赵荣璇、表嫂岳峻明、诗友潘伯鹰、高梦兰、市政协副秘书长方镇华等,1959年7月30日捐赠给学校图书馆的书中也有“《吴宓诗集》二部”,为什么迟至1962年2月12日才送给方敬呢?是疏忽大意还是有意为之?如果是有意为之,则更要追问为什么以前不送而现在送了?促成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什么?二是所送鼠啮之《法文小字典》在次日日记中还注明“在美国时所购”,且改为“呈交敬批阅”^{[7]417}。到底是赠送还是借阅?为什么又改口不言“赠”了呢?是因为品相问题还是有其他考虑?三是奉赠《英法德文小字典》后的“敬收谢”有别于《吴宓诗集》送赠后的“即得函复”与《法文小字典》交付后的没有反应记录,是方敬仅对《英法德文小字典》称谢呢,还是都有称谢而吴宓前两处漏记或忽略了?吴宓与方敬交游中的这些疑点,都还有待进一步考释和破译。

(四)参加会议

会议是人们聚集起来开展讨论和交流的社会活动,“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开会仪式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运转模式”^[11],参加各种会议是吴宓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其中不少会议都有方敬出席、讲话、总结,会议也就成了吴宓与方敬交往的重要平台之一,二人不时在会前、会中和会后就某些问题交

换意见。相关会议五花八门,既有省级、市级、校级、系级和教研组的会议,也有工作会、学习会、座谈会、报告会、行政会、学术会、检查会、辩论会。吴宓作为院务委员和一线教师,参加校内级别最高的院务委员会和基层的教研组会议,都在情理之中。任学校领导后的方敬仍经常出现在基层会议中,显示了方敬工作上的兢兢业业和深入细致。举一个具体例子:1965年2月5日,“下午2—6上班,古典文学教研组会议,议开学二月十一日前(一)备课(二)助阅函授生考卷二事。而方敬副院长及工作组尹院长、陈、吴、范同志悉监临……,最后由方院长作总结,甚详明”,“散会后,宓与方院长同出,至楼门内,复强方公伫立,毕宓所言,略谓……方公答曰……遂别去”。可见方敬参加最基层的教研组会议并非一般空谈,而是有专门的准备,有详明的总结,让在座的参会人员如吴宓等有多方面的收获,觉得“方公所言极确,宓甚服”。对于吴宓而言,这样的会议还为会后和方副院长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甚至“强方公伫立”,继续倾述“故老教师如宓等者,今后断不宜授课,但仍可以知识及学术之材料、解释供给前进之青年教师,譬如在延安时,设兵工厂聘用英美籍之工程师、技术人才,又何不可?前两年进修班之办法殊善,惟宓授课不免多疏误耳”。更有意思的是,吴宓随后还在日记中加了一段按语:“按,会散时,方公已甚倦,且有他事,宓乃强与谈关于宓后来之事,且宓言极不合当前形势及政策。宓之痴愚及错误甚矣,于是大悔恨。”^{[8]40-41}既体谅方敬,又反思自己,“强与谈”与“大悔恨”之间看似矛盾,实则体现了吴宓对方敬的真情。

二、交往内容:政治的与个人的

方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诗人。他和“汉园三诗人”关系密切,是何其芳的妹夫,有诗集《雨景》《声音》《受难者的短曲》《行吟的歌》《拾穗集》《飞鸟的影子》等。他与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等一起创办《工作》半月刊,主持《工作》杂志社,主编《大刚报》文艺副刊《阵地》等,也是《诗创造》《诗》《创作月刊》等刊物的重要作者,被视为“九叶诗派”的外围诗人^[12],或被直接归入“九叶派”^[13]。1945年李广田撰长文《诗人的声音》“论方敬的《雨景》和《声音》”^[14]。1948年陈敬容刊文《和方敬谈诗》并“为新诗前途祝福”^[15]。钱光培讨论“中国新诗史上的方敬”时认为他“以丰厚而扎实的创作成果展示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诗所达到的高度”^[16]。方敬还有散文集《风尘集》《记忆与忘却》、小说集《保护色》及翻译作品集多种问世。当然,方敬还以其长期的教书育人生涯和丰富的教育管理实践培养了不少人才,是学者型的领导,也是文学家本色的教育家。方敬既是吴宓的老朋友,是同行,是知己;也是吴宓的直接领导,是教学的管理者,是政治的指导者。方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吴宓与他的交往内容非常丰富,既有政治话题,也有个人事务。兹择其值得重视的三个方面略作讨论。

(一)寻求政治指导

对于自己与方敬的私交,吴宓很早就有了定位。1951年4月25日,吴宓在从方敬处得知重庆市文联会已内定聘自己为古代文学门的五名代表之一后,专门邀请方敬来家里商量,准备将席位让给友人,而“敬谓当局思考周密,最后决定如此,非忽略诸君,宓可勿辞”。随后吴宓表示“从之”,而且说“论私交,宓愿为敬之专门顾问,祈敬为宓之政治指导”^{[2]120}。事实上,以后的吴宓也一直把方敬视为值得信赖的政治指导,最典型的当数1951年底至1952年初“土改诗案”中的政治指导。

1951年12月6日,吴宓得知自己的“《国庆》诗、《赠兰芳诗》四首”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密查,十分忧惧。1952年1月8日,在西师教师学习委员会成立会上,又被文教部新派来学校主持思想改造的董学隆“举西师某教授反对土改之诗句‘易主田庐血染红’加以责斥”,虽“未明揭宓姓名”,吴宓已“甚惊忧”^{[2]275}。他次日上午就“撰《易主田庐血染红》诗案坦白文”,且在午饭后庚即“访敬于其家,自陈诗案,求指示”。方敬一方面认为“诗案非政治行动,乃思想问题,不必作专案坦白,只宜检查宓自己之思想。将来在改造学习小组中,暴露宓所具之封建思想,届时可举宓所作诸诗为例证、为材料,即藉此坦白可矣”,又“诵宓《送兰芳土改》诗,谓文教大会小组中研究此诗,指‘僧诵佛名行杀戮’

句，疑必讥刺人民政府名为宽仁而实嗜杀行暴云云”，在吴宓“急为之解”后说：“政府本尊重而礼待宓，敬更深知宓平生不参加政治，决无行动嫌疑。惟宓思想未纯，又素重感情，所谓温情主义者，难免不良之人，如□□□等，乘机以诗文或他事与宓接近，而别有所图，宓恐堕其术中，为所利用，是宜慎防云云。”^{[2]275-276}方敬这几句话，既有明确判断，言其不必作专案坦白；又进一步深入，疑吴宓讥刺人民政府名为宽仁而实嗜杀行暴；还有心理安慰，深知吴宓平生不参加政治，决无行动嫌疑；更有示警预防，吴宓恐堕其术中，为所利用，是宜慎防。方敬的这次指导不失为一次成功的政治指导，只是不知吴宓领会了多少。十余天后，1952年1月21日，方敬在有院务委员、党、团和各民主团体成员参加的座谈会上有所自责，发言中“曾两提宓名（一）敬与宓以情相结，而宓有封建思想，曾犯错误（指诗案）。敬未能事先觉察纠正，是敬之失”，吴宓随即理解方敬“未明指宓之诗案，故宓亦无须即坦白”，明白“敬对宓仍有回护周旋之意，而诃宓于敬之小人恐已不止一二人也”^{[2]283-284}。方敬发言中“以情相结”的自述与“未能事先觉察纠正”自责，既显示了对吴宓的情感与态度，又完成了对组织的交代与表态。感情丰富如吴宓者，在明白其“回护周旋之意”后，内心的情感震动与波澜可想而知。十余天后，1952年2月7日下午，在系组分别检讨（续三反运动）的三组学习会上，在方敬自陈自责并接受众人评断之时，吴宓“感情所激，不能自忍，遂发言，谓宓实累及敬。遂自陈解放以来，当前有三途（一）改造（二）分别内外而奉行公事（三）就死。自譬如马，乐得御者如敬，而畏新来御者如董学隆等人。去夏颇觉坦适愉快，冬则诗案起，当为敬之所不及料。宓一切无所隐讳，生死等观，听命而已”^{[2]293}。吴宓这段发言，不仅承认自己连累了方敬，而且自降身份，把自己比为马，把方敬比为御马之人，以得到方敬这样的御马者为乐。这就鲜明而形象地表明了吴宓对自己与方敬关系的认知，以及对方敬的领导与指导的倚重。至于吴宓作为方敬“专门顾问”的一面，《吴宓日记续编》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记载，且容另文讨论。

（二）谈论文化名流

方敬是诗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吴宓在与方敬交往的过程中不时谈论同时代的文学界名人与掌故，共话诗人与诗歌。这些内容既是吴宓与方敬交游的见证，也是了解相关人士及其活动或评价的线索，丰富了《吴宓日记续编》的价值与内涵。

1956年6月9日，“次敬述在京所见所闻诸友生如冯友兰、冯至、钱锺书、李赋宁等之情况”^{[5]445}。方敬交游圈颇广，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就可以据所见所闻带回一批文化人的最新消息，其中和吴宓的友生圈形成交集并被吴宓记录下来的就有冯友兰、冯至、钱锺书、李赋宁等。这种共同的朋友和共享的交际圈，也是吴宓和方敬能够长期维持良好私人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口耳相传的信息传播是当年偏居西南的吴宓了解全国友生消息的重要方式，那么方敬这样的友人就是相关消息传递的重要渠道。1957年4月19日，“8—11赴袁炳南宅茗叙……客为方敬、叶麀。多谈述近世新派文人如梁宗岱、巴金（李芾甘）、田汉等之生平性行，及卞之琳近爱文怀沙之妻，伊倾心归卞，幸得离合如意，卞已与伊结婚，甚圆满，云云”^{[6]55-56}，这即是一处文人圈内传播情事掌故的例子。虽没有记录下来具体的“梁宗岱、巴金（李芾甘）、田汉等之生平性行”，但可推知大抵多少会与甘少苏、萧珊、安娥等女性相关。具体记录下来的卞之琳与青林的情事和婚事，是建国后少有的逸闻趣事。材料显示卞之琳结婚时间是1955年10月。时隔年余，才成为远在北碚的文人圈的谈资。特别是透露“近爱文怀沙之妻”“伊倾心归卞”“幸得离合如意”三部曲，远比年表式的简单著录来得精彩，可供研究者参考。让读者有些不满意的是，吴宓本人或方敬对这些文人情事的态度如何，日记没有记载。好在一月过后的1957年5月23日，又有一次类似的文人雅集，吴宓记录了自己与方敬的态度。“晚8—10访瑜、欧夫妇于合作村十三舍新居，敬适在，阎童亦来……敬述胡适讲学办事谈话之诸多轶事。而断定适为骄傲自满、极富于虚荣心之人。宓早拟适乃Burke评卢梭为‘虚荣之哲学家’一流。敬又述叶公超之才华及其上课时随意挥洒、极不负责之态度。”^{[6]391}友人间以谈论共同关注的文化名流为乐，得知方敬关于胡适“骄傲自满”与“极富于虚荣心”之评论，恰好暗合自己早年

就把胡适归入“虚荣之哲学家”一类的观点，自然会产生共鸣，产生知己感与归属感。而对当年同为清华大学外文系名教授的叶公超“上课时随意挥洒、极不负责之态度”的回忆与批评，也是对一直秉持严谨认真上课态度的吴宓的肯定和支持，想必也能间接带给吴宓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这样的有共同圈子且能随性漫谈个人话题的知己朋友，谁能不珍视、倚重并交往下去呢？

（三）咨询其他意见

从《吴宓日记续编》记录的吴宓与方敬的交往看，方敬对吴宓的指导或吴宓寻求方敬指导的范围相当广泛。吴宓不仅在“土改诗案”或“自我检查”面前会请求方敬的指示，而且在年度科研题目、具体研究计划与进修生培养，乃至友生及自己的人事安排、个人情感与婚恋，甚至文章修改处理等方面也会主动向方敬报告，咨询方敬的意见。

1959年1月2日上午，吴宓到和平村新居给方敬拜年，并“以科学研究及著作，宓今年应择何类题目，求敬指教”。方敬不客气地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答复指导：“首以教学职务为重，应先编完《西欧及东方各国现代进步文学》讲义，须赶七月一日以前全竣”，“其次，应精译英国古典文学之诗文名篇如宓昔译萨克雷之《名利场》，以及傅东华译弥尔顿之《失乐园》。足以表现宓之学问及才力者。或作英国文学研究论文。若夫宓欲为《译文》月刊今改名《世界文学》译稿，则可不必要，因（1）无取乎由希腊、拉丁或德、法等文之英文译本中转译，应由原文直译。（2）现代各国之进步文学，其新书新报，在京各有人消息灵通，专事搜罗，资料一入彼等之手，迅即译出。宓远在西南，断难与之竞驰，且亦不合宓之地位身份”，“第三，宓有意作自传或小说或见闻杂记，甚好，宜先作短篇，由此入手”，“第四，作旧诗歌颂新时代之新事物，此在宓不费力，随时可作”。咨询者，或曰求指导者吴宓的态度也非常明确：“敬所劝告者，皆极是，当从其言。”^{[9]4}客观地说，方敬所讲的四点，显示了丰富的学养、开阔的视野与精到的见识，既重点突出，又循序渐进，还量体裁衣。尤其是上述第二项表现了四个突出特点。第一，“精译英国古典文学之诗文名篇”与“或作英国文学研究论文”，的确是“足以表现宓之学问及才力”的两大途径，既能发挥吴宓多年留学期间积淀下来的深厚英国文学修养及研究专长，又能切合当时翻译界与研究界的现实需要。第二，“足以表现宓之学问及才力”的选择与评价标准，既为吴宓个人考虑，这样才能继续得到学校的优待与尊崇；也为学校发展打算，这样才能借助吴宓译作的力量扩大学校的声誉与影响。第三，对应作之事明确支持，也对不必之事直接反对，有所为有所不为，观点鲜明，绝不骑墙。第四，反对吴宓为《世界文学》译稿，列出了三点理由：一为译本选择的原则与翻译的方法，从理论着眼；二是新书报翻译的北京之专长与西南之局限，从实际出发；三是吴宓自己在圈内显赫的地位和崇高的身份，从自身考察。上述各点，可谓全面深入，滴水不漏。其他咨询的例子还有很多，如：（1）“4：00 敬再来，宓请商（一）驹（二）抚（三）荃事。敬具恳切示答，甚慰。”（1951-05-28）^{[2]142}（2）“上午9：00 谒方敬教务长，商改宓四月二十三日为《院刊》所撰文，改题为《知识分子之安排与使用》，删去篇首自叙1949→1952→1955→1957 心情变异之一大段，余仍旧。敬对宓甚关切，如此删改，实较妥善也。”（1957-04-29）^{[6]70}（3）吴宓到方敬家里访问，“语以吴芳吉研究之（甲）（乙）两种计划，求其指示”（1960-01-16）^{[9]278}，方敬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4）吴宓在为江家骏拟的三种学习计划的取舍中久决不下，“9：30 偕骏至教务处谒方敬教务长，请求决示。敬确定为宜用（三），他年再徐进至（二）及（一）”，吴宓表示“自当遵从”（1962-08-04）^{[7]390}。

三、交往效果：现实的与精神的

由于方敬“文革”前在西南师范学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吴宓与方敬的交往常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在前述交往中已可见一斑，比如谈论文化名流时的慰藉与满足，比如求得政治指导时的“欣愿遵行”与指导后的“如释重负”，比如咨询方敬意见后的“当从其言”与“自当遵从”等。在现代人际关系学的“社会交换理论”中，“成功命题”即是“对于人们进行的所有行动来说，一个人的某种行为得到的报酬越经常，这个人就越愿意从事这种行动”^[17]。吴宓与方敬的交往经常成功地

得到他所期望的回报,获得现实的支持和精神的满足,那么方敬就会对吴宓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吴宓也就会越发愿意与方敬保持交往,重要的事情均倚重方敬,愿意听从方敬的意见。《吴宓日记续编》中有不少例子体现了这样的交往效果,篇幅宝贵,仅在解决现实困难与精神困扰方面各举一例。

例一:运书解决现实困难。1955年12月26日,吴宓与方敬“立谈久之”后,“敬自任代高院长由学校取运宓书六大箱由京至碚,即以酬宓所捐书、由学校代出全部运费云云”^{[5]337};三天后,“敬来,谓王、谢二副院长均深荷宓捐书与学校之意,正筹议详细办法云云”^{[5]340}(1955-12-29);数月后,“图书馆侯文正来告,宓五书籍已运到”^{[5]407}(1956-03-23)。在方敬支持下,吴宓运书之事得到圆满解决,吴宓顺利地收到了在北京寄存已久的诸多书籍,学校图书馆也收到了吴宓捐赠的数百册图书。

例二:辟谣顿释精神困扰。1961年7月22日,与方敬谈约一小时,得知“院系调整,敬谓绝无其事,尽属谣传,且其谣传已久。张院长赴京,并非为此事,即有小调整,亦不涉及中文系,更不涉及宓,请宓勿忧,云云”,吴宓“多日忧急悲郁之情,为之顿释”^{[7]120}。一个“为之顿释”,足见与方敬交流得知的学校内部消息对吴宓的宽慰之力与冰释之功,具有直接而显著的效果。

不管是运书这样的现实困难,还是谣传带来的精神困扰,仅凭吴宓之力似乎难以克服。在方敬也许并不费力的帮助下,均得到了直接有效的解决。与方敬的交往越是经常得到“回报”,吴宓就越愿意保持这种交往。吴宓与方敬的交往显示了他令人感佩的性情与人格,不管方敬是春风得意、步步高升还是受批挨斗、墙倒众人推,吴宓对方敬一直都是怀有尊重之情。1966年8月1日,“工作队林部长对全校播讲《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西师》,略谓两月(五、六)中已揭发出副院长王逐萍、方敬黑帮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晚间“古典文学组文化大革命运动学习会,讨论林部长报告,批判王逐萍,批判方敬”,吴宓仅“发言一次,敷衍而已”,在日记中说“今知运动转入批判斗争阶段,宓不胜忧惧。众对王逐萍及方敬皆‘墙倒众人推’,纷纷从井下石。其实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8]503}。吴宓始终以“仅一方敬”“惟一功臣”“知己”评价方敬,足见其刚直不阿的真性情与不趋时流的高尚人格。吴宓以“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比喻方敬厚遇自己,而自责不敢在方敬“覆亡”之际为之恸哭,可以看出其严格的道德自律与剔骨见髓的自我批判精神。

在私人日记中能出现这样的公允评价固然可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吴宓还在次日晚间的工会组织生活会上公开发言:“(一)西师领导人中,惟敬是文化人、知识分子,曾在大学与教育界,懂学问与业务,(二)进修班,以及研究生,提高业务等办法,在当时似由中央教育部发出指示,全国一致(恐非敬个人主张)”^{[8]504}。吴宓的公开发言虽被批评为美化方敬,为方敬辩护,无法改变甚至反而会进一步招致组员对方敬的攻诋,且吴宓自己也“诚悔多言之失矣”,但突出显示了吴宓不畏人言与重义尚德的风采。之后,吴宓继续为“敬日食甚少”“敬血压甚高(在梁平)”而“哀哉”,关心并记录方敬作劳改队队长“对排队、呼口令之事不熟习,一群‘红卫兵小将’立即当众痛殴敬甚重”^{[18]206}的惨状(1967-08-04),以及因妻子报告方敬曾被红卫兵小将抢去钱物而遭报复,“在风雨操场劳动时,暴童三名持钢刀至,责敬漏泄秘事,罪当死,即用刀砍敬,中左肩后,伤口长及寸”^{[18]228}的惨剧(1967-08-24)。在组织要求“写交‘忠诚的干部’的时候,吴宓仍“举(一)方敬(二)总务处邝科长(1967六七月武斗期中,奋力维持员工二食堂不断开伙,供给员工膳食)二人人为西师之‘忠诚的干部’”(1969-02-10)^{[4]50}。

当然,吴宓与方敬的交往还有其复杂之处,偶有并不和谐的情形。有时感到尴尬:“敬总结以宓与许文斗劣生相提并论,亦加称赞,诚令宓啼笑皆非矣。”(1952-06-23)^{[2]373}偶尔也不乏批评:“敬演讲,甚冗而复。”(1952-09-01)^{[2]409}有时有所保留:“欲以心事告敬,而未敢。”(1953-04-18)^{[2]519}偶尔私下辩驳:“上午8—9委来,详述其兄澄之疯疾情形……澄承重力大,步履极健,能饱餐;敬以此疑之,谓其病全是假装,佯狂以避供招。然昔雪等之疯固亦如此。”(1957-09-29)^{[6]184}有时语见机锋:“晡夕3—6大礼堂(俗名新饭厅)赴全校大会,聆方敬副院长以其缓慢、冗长、虚浮之清谈式语调,首

先批判林彪及其党徒……方敬慨叹彼多占房屋者之不合与自私，其实由学校行政分派前往劝告，命其腾出，其事固易解决也。”(1973-09-06)^{[3]472}。也许是正因为其复杂，才显示出吴宓日记的真实，才折射出吴宓为人的真性情，才值得进一步研究与解读。

行文至此，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吴宓与方敬走得这么近，有着频繁而相对密切的交往？在笔者看来，应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方敬懂教育，有学识，有着不同于1950—1960年代工农出身的部队文化干部转入高校做领导的文人特点。吴宓在日记中先后提到的西南师范学院领导还有谢立惠、姚大非、张永青、王逐萍、孙泱、郭英、李哲愚、徐方庭等，从吴宓所记内容看，应该说他们对吴宓还是不乏尊重的，也偶有拜访、晤谈、“附乘”小汽车之举，并且在宽限假期、关照入西南医院接受治疗等方面给予特殊的照顾，甚至吴宓还记下了与张、谢、王三院长乘小汽车入城参加会议，晕车，下车呕吐，而“三院长陪宓步行一段后，乘车前行。王院长以司机旁之前座让宓，得在窗口迎风呼吸”^{[6]16}的动人场景。但吴宓与他们的交往始终不像与方敬这般亲近，很少流露情感，也几乎没有个人评价。倒是记录下了谈话中同事对他们的批评，如“本校当局之列党籍者，如张院长，军级如王、姚副院长……惟苦于无学问，甚乏学校行政之知识与经验。故虽欲图治，行事多左。又乏知人之明，故用人每不当……至于本校当局之非党员者，如谢立惠副原正院长、李源澄副教务长，固屈己徇人，毫无建树。即方敬教务长虽系党员而资历较浅，前数年实为西师全校之主，兼党、政、学之领导于一身者”^{[5]519-520}；如“述本校张院长厚实而有定识；王爽快而明决，姚急躁而热情，但皆犯错误，今实权操之张院长一人，身兼党与政，故校事多积压而纷乱云云”^{[6]84}。吴宓在日记中记下这些批评意见，而又没有表示反对，应当可视为一定程度的认可。和这些领导比起来，方敬更富有学识，更学院派，更知识分子，不仅是表面上的出于礼仪的尊重老者贤者、而且是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道德和情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宓认同了方敬的特殊身份，喜欢他的个人气质，愿意引为知己。

二是吴宓在与方敬的交往中也得到了相应的尊重和理解，非常愿意与方敬来往。方敬50年代担任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后作学校教务处长，直至学校副院长，一直是吴宓的领导。有意思的是，吴宓一生几乎都在大学里，他喜交朋友，但却很少与学校领导成为朋友。何况1949年以后的大学被列入行政单位序列，已完全行政化和政治化了，这也是吴宓在共和国时代的生存环境，运动不断。吴宓与方敬的交往，让吴宓有了深入了解和进一步熟悉共和国初期大学特殊环境的桥梁，让他释了惑解了疑，得到了尊严，在某种程度上还获得了政治的依靠和进步的信心。

三是方敬也愿意与吴宓交往。吴宓日记之外，尚未发现方敬谈论吴宓的佐证。在已出版的《方敬选集》和其他方敬的文集里面，看不到有关吴宓的只言片语。也许是这些方敬著述出版时间较早，也许是方敬本身就没有记录过吴宓，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遗憾。但从吴宓日记可以看到，方敬也不乏主动找吴宓交流的时候，而且在与吴宓的交往中并无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不耐烦的心态，更没有“左”的作派，是乐意吴宓的接近或亲近的。

方敬对吴宓的关爱还可以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得到印证：比如吴宓的邻居彭维金回忆“方敬先生虽是院领导，却以‘知识分子的朋友’著称。50年代，方敬同志在一次会上说：‘吴宓等教授的猫上了房顶，你们（指后勤、教务职工）也要想法给他们捉下来！’这当然是诗人的形象说法，亦可见他对名教授的重视态度”^[19]。吴宓的学生赵庆祥回忆称吴宓与方敬“虽然彼此在政治观点和学术见解上不尽相同，但互相尊重，关系融洽……公正地说，历史系在反右第二阶段逼吴宓老师交反动诗词的事，当时的方教务长为保护吴宓老师是作了工作的，在关节上替吴宓老师疏通了，缓解了当时的紧张关系”^[20]。吴宓更亲密的学生江家骏在回忆中强调“对于雨师，方敬同志对他的关怀照顾也是很多的”^[21]，还提供了方敬在病床上仍语重心长地谈到吴宓并突出其进步性的细节等。总之，吴宓与方敬的交往在不同角度会有不同解释。从吴宓的角度看，既是社会环境使然，也是个人情趣相投和精神寄托，甚至不无吴宓的生存策略；从方敬的角度看，既源于其诗人气质和文人习性，源于

其理解尊重资深学者和文人的道德风范,又有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推力。

《吴宓日记续编》是一座富矿。吴学昭女士在《吴宓日记续编》前言中认为:“父亲用自己的日记见证了历史,历史也通过日记确证了父亲及一代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心路历程留下浓重的痕迹,留供后人研究,也许,这就是《吴宓日记》价值所在。”^{[2]6}刘梦溪说:“《雨僧日记》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日记体中国现代学术史叙录,也是一部现代学人的文化痛史,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均不可低估。”^[22]《吴宓日记续编》所载吴宓与方敬的交往,不仅是了解、还原和研究二人在共和国时代的文人心态、生活情状、精神气度与思想风貌的重要史料,也对我们认识和反思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总结历史经验并促进文化繁荣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对党的政策是衷心服膺的,正如有学者在谈到建国初期还珠楼主武侠小说创作的转向时所说,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管理工作方式及效果的生动呈现”^[23]。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继续讨论,以及类似吴宓与方敬这样的学人交往之深入考察,还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 [1] 方小早,方小明. 吴宓与方敬[G]//王泉根. 多维视野中的吴宓.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107-113.
- [2] 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3] 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10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4] 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5] 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6] 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3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7] 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8] 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9] 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4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10] 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6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34.
- [11] 王本朝.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39.
- [12] 蒋登科. 九叶诗派的合璧艺术[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5.
- [13] 子午. 中国当代流派诗选[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 [14] 李广田. 诗人的声音——论方敬的《雨景》和《声音》[J]. 诗文学,1945(1):13-16.
- [15] 陈敬容. 和方敬谈诗[J]. 诗创造,1948(12):32-33.
- [16] 钱光培. 中国新诗史上的方敬[J]. 当代文坛,1994(4):34-37.
- [17] 玛格丽特·波洛玛. 当代社会学理论[M]. 孙立平,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47.
- [18] 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19] 彭维金. 我的邻居吴宓先生[G]//王泉根. 多维视野中的吴宓.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103.
- [20] 赵庆祥. “文革”与“反右”中的吴宓[G]//王泉根. 多维视野中的吴宓.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150.
- [21] 江家骏. 怀念恩师吴宓(雨僧)先生[G]//黄世坦. 回忆吴宓先生.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146.
- [22] 刘梦溪. 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J]. 中国文化,2013(2):149-163.
- [23] 蔡爱国. 还珠楼主“从新写起”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武侠转向[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22-129.

责任编辑 韩云波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